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經學歷史

(一)

周予同註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經學歷史

(一)

周予同註釋

學國叢書

序言

——一、經學之三大派——二、經學史之重要與其分類——三、皮錫瑞傳略——
四、皮著經學歷史批判

一

皮錫瑞經學歷史是經學入門書籍，可以說是「經學之導言」；本篇之責，在介紹經學歷史於讀者諸君之前，則不過「經學導言之導言」而已。然而因爲是經學導言之導言，所以不能不對於經學先作鳥瞰的說明，以冀顯出經學史的重要與本書的價值。

中國經學，假使我們慎重點說，追溯到西漢初年爲止，也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。這二千多年中，經部書籍，因爲傳統的因襲的思想關係，只就量說，

也可以配得稱「汗牛充棟。」不說別的，我們只要一看納蘭性德彙刊的通志，堂經解，阮元王先謙彙刊的正續清經解，也幾乎使你目爲之眩；至若列舉朱彝尊經義考的書目，那真所謂「更僕難數」了。但是，假使我們能應用大刀闊斧的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，則這許多繁重的著作，也不過可以歸納爲三大派，所謂「經學之三大派。」這三大派都顯然地自有其立足點與特色；就我的私意，可稱爲（一）「西漢今文學」，（二）「東漢古文學」，（三）「宋學。」

西漢今文學發生於西漢，就是所謂「今文十四博士」之學。在西漢時候，因帝王之利用的提倡，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。後來因古文學的暴興，與鄭玄、王肅的混亂家法，遂漸漸的衰落。延至曹魏西晉，因政亂及胡禍的過烈，連僅存的章句傳說也多隨兵燹而俱滅。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，因社會政治學術各方面趨勢的滙合，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而復活，居然在學術界有當者披靡之象。當時所稱爲「常州學派」、「公羊學派」，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。現

在滿清覆亡已十六載，而這今文派的餘波迴響仍然在學術界裏存在着，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徑發展去。

東漢古文學，稍爲慎密地說，可以說是發生於西漢末年。到了東漢，因爲今文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，大有取今文學而代之之勢。鄭玄王肅雖說混淆家法，但究竟左袒古文學，所以魏晉時代，今文學亡滅，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。後來六朝的南北學，隋唐的義疏派，雖虛實繁簡，不必盡同，而其立場於古文學則無殊異。一直到了北宋慶歷以後，經學上的懷疑學派——宋學——崛起，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暫時衰歇。但元明之末，因爲姚江學派之流於虛妄，及滿清思想壓迫政策之實現，於是顧炎武扛了「舍經學無理學」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。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，遂爲這一派所獨佔；所謂以惠棟爲領袖之「吳派」與以戴震爲領袖之「皖派」都和東漢古文學有血統的關係。

宋學之懷疑的精神，唐時經師如啖助、趙匡、陸淳輩已開其端；但這種風氣的盛行，則不能不說在北宋慶歷之後。到了南宋，因研究方法的不同，雖可分爲以程頤朱熹爲領袖之「歸納派」，以陸九淵楊簡爲領袖之「演繹派」，及以葉適陳傅良爲領袖之「批評派」三派；但他們立足於哲學的見解，以理欲心性爲論究的對象，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，則初無二致。元明以來，歸納派的朱學，因朝廷的提倡，僥倖地取得正統的地位；而演繹派得王守仁（陽明）生力軍似的加入，也頗能得具有天才的學者的信仰。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言理學，結果所謂「尊德性」者固然是流於禪釋，即所謂「道問學」者亦空疏無一物。於是元明二代成爲經學史上之衰落時期，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乘之而復興。

上文「經學之三大派」說，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敘述；假使詳密的觀察，不僅清代復興的古文學與東漢原始的古文學不同，清代復興的今文學與

西漢原始的今文學不同，元明的宋學與北宋的宋學不同；即各派自身的流別，以及學者自身思想的變遷，都須加以煩瑣的說明；但這決不是這簡短的篇章所可容納，所以不能不從刪略了。這三派的不同，簡勁些說，就是今文學以孔子爲政治家，以六經爲孔子致治之說，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，其特色爲功利的，而其流弊爲狂妄；古文學以孔子爲史學家，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，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，其特色爲考證的，而其流弊爲煩瑣；宋學以孔子爲哲學家，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，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，其特色爲玄想的，而其流弊爲空疎。總之，三派固各有其劣點，亦各有其優點；我們如果說：因經今文學之產生而後中國之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，因經古文學之產生而後中國之考古學文字學以立，因宋學之產生而後中國之形而上學倫理學以成，決不是武斷或附會的話。

最後尚須附帶說明的，就是：關於經學的分派，前人有採二派說的，有採四

派說的，我個人覺得都不盡妥善。二派說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代表；牠以爲：「自漢京以後，垂二千年……要其歸宿，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。」
①其後江藩漢學師承記、宋學淵源記，②阮元國史儒林傳序，③都取此說。其實他們所謂「漢學」，是專指東漢古文學，並不包括西漢今文學而言。這樣，不正是截去經學史的首尾嗎？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前序說：「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，皆賈馬許鄭之學，乃新學，非漢學也。」這種譏評的話也確有一部分理由。採取四派說的，推近人劉師培。劉在經學教科書④序例中說：「大抵兩漢爲一派，三國至隋唐爲一派，宋元明爲一派，近儒別爲一派。」這話也很有商榷的餘地。宋元明固自爲一派，兩漢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學兩派嗎？三國隋唐不就是古文學的支流嗎？劉氏所以有這樣疏略的話，或者是強以時代分派之故。

上文敘述經學之三大派，其目的不過在與讀者以經學上之簡明的概念，以爲進論經學史之預備而已。

中國經學研究的時期，綿延二千多年；經部的書籍，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，已經達到一千七百七十三部，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；^⑤但是很可駭怪的，以中國這樣重視史籍的民族，竟沒有一部嚴整的系統的經學通史。自然，經學的史料是異常富豐的，廣義的經學史或部分的經學史亦不是絕無僅有；但是，如果說到經學通史或經學歷史，而且是嚴整點的、系統點的，那我們真不知如何答辭了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第一冊，固然不能說不是通史；但是以兩位近代著名的經今古文學大師，而他們的作品竟這樣地簡略，如一篇論文或一部小史似的，這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了。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經學史論，已由東京弘文堂出版。以具有二千餘年之經學研究的國度，而整理經學史料的責任竟讓諸異域的學者，這在我們研究學術史的人，不能不刺

骨地感到愧慚與恥辱了。

況且，就是撇開這種感情的話，而只就中國其他學術的研究而言，經學通史的撰述也是決不可少的。我們研究古史學，我們能不取材於尚書左傳周禮等書嗎？但一談到這三部書，則尚書的今古文成問題，左傳的真偽成問題，周禮是否爲實際的政績的記載成問題。我們研究哲學史或思想史，我們不能不論及易與春秋，而易的產生的時期與思想的來源成問題，春秋的筆削的命意與公穀左氏的異同成問題。我們研究古代民衆文學，當然首及詩經，而關雎等篇之爲美刺成問題，靜女等篇之爲淫否成問題。最後我們說到古文字學的研究，則六書的起源，壁中古文的真偽，籀篆隸的變遷，無一不成問題，也無一不與經學發生密切的關係。至於將來比較宗教學、文化人類學、民俗學等的研究，則不僅當探究易禮之原始的意義或背景，即舉世斥爲妖妄怪誕而與經學有關的緯讖，也是絕好的資料。但是說，要研究哲學、文學、史學、文字學等等的學者都先

要向經學下一番苦功，不是太不經濟嗎？不是太不了解學術分工的功用嗎？所以我說，在現在，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，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。因為牠是一方面使二千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，他方面爲中國其他學術開一條便利的途徑。

我這樣地熱望着經學史的產生，或者會引起一般隨俗者的誤會。自然，我是十分清楚的，現在時髦的口號是「打倒孔子」「廢棄經學」；但是我所不解的，是他們之無理由的打倒與廢棄，不足以服頑舊者之心。我自是贊成「打倒」與「廢棄」的，但我自以爲是站在歷史的研究上的。我覺得歷史派的研究方法，是比較的客觀、比較的公平；從歷史入手，則孔子一部分的思想與經學一部分的材料之不適於現代，不適於現代的中國，自然而然的呈獻於我們的面前。我們不必高呼口號，而打倒與廢棄的理由已了然於胸中。所以我們就是反對經學之學術史的研究，而只是立足於致用的功利的觀點，那經學史的完

成也似乎是現代的工作之一。

經學史之需要，既如上述，而在中國舊有的著述中，經學通史又這樣異常的缺乏；所以我們現在只得將牠的範圍放寬些，以尋求性質相近而較有價值的著作。這種著作，大概可分爲三類：（一）以經師爲中心的，例如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、張金吾的兩漢五經博士考、王國維的漢魏博士考、江藩的漢學師承記，而洪亮吉的傳經表、通經表，以及各史中的儒林傳或儒學傳等屬之。這類著作的缺點：第一，每每是斷代的記載，不能看見經學之整個的趨勢；第二，每每偏重個人的成就，而抹煞某一時代之全體的表現；第三，甚至於僅有姓名而無事實，或附以極簡短的小傳，大有一「點鬼簿」之誚。（二）以書籍爲中心的，例如朱彝尊的經義考、翁方綱的經義考補正，而鄭樵通志的藝文略、馬端臨通考的經籍考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，以及各史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的經部屬之。這類著作的缺點，大致與前者相同；雖然大多數不是斷代，但其不能表示

經學之整個的趨勢則一。(三)以制度典章爲中心的，例如顧炎武的石經考、萬斯同的石經考、杭世駿的石經考異、王國維的五代兩宋監本考^⑨都是；而在古代，選舉學校與經學也頗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通典的「選舉門」、「通志的選舉略」，通考的選舉考學校考也可以屬於這一類。這類著作的缺點，即每每僅爲羅致若干的史料，加以排比，而不能顯出這種制度典章在經學上之前因後果與其相互間的關係。總之，想真切的了解經學的變遷，以上三類書籍只能作爲輔助的或分門的參考資料，而仍有待於經學通史。因爲這種原因，所以這樣簡略的皮著經學歷史竟成爲適應需要而另有價值的著作了。

我年來時常作如此的計劃，假使我的環境與學力允許我的話，我將獻身於經學史的撰著。我將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較詳密而扼要的經學通史，使二千年來經學的變遷，明晰地系統地呈獻於讀者。其次，分經撰述，成易學史、尚書學史、詩經學史等書；其次，分派撰述，成經今文學史、經古文學史、經宋學史及經古

今文學異同考、經漢宋學異同考等書；再其次，以書籍或經師爲經，以時代爲緯，成歷代經部著述考與歷代經學家傳略；再其次，探究孔子與經學的關係，成孔學變遷史與孔子傳記；最後，我將以我個人的餘力編輯一部比較可以徵信的經學年表與經學辭典。自然，這在具有天才的學者們，或以爲這是胥鈔的事，而加以輕蔑的冷笑；但我總覺得學術要專攻，這初步的整理的工作，也應該有人忠實地埋頭做去。我希望着，不，我熱望着，我熱望着我的環境與學力能够允許我，而同時熱望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，而到得幾位學術上的伴侶。

三

在經學史這樣需要而缺乏的時候，則皮錫瑞經學歷史之有一讀的價值，瞭然可知了。現在在未談及經學歷史之前，請先紹介皮氏的生平與他的學術的大概。

皮先生名錫瑞，字鹿門，湖南善化人。早歲頗有經世之志，留心於郡國利病。

光緒戊戌政變時，因提倡學校制度，大受其故鄉頑舊者的疾視，甚至於斥爲亂黨，不得已避居他邑。皮氏治經，宗今文，但持論平允，沒有康長素那樣的武斷，也沒有廖季平那樣的怪誕。他所著的書，除經學歷史外，還有易經通論一卷，書經通論一卷，詩經通論一卷，三禮通論一卷，春秋通論一卷，總稱五經通論；今文尙書考證三十卷，古文尙書疏證辨正一卷，古文尙書冤詞平議二卷，尙書大傳疏證一卷，尙書中候疏證一卷，史記引尙書考一卷，禮記淺說二卷，王制箋一卷，春秋講義二卷，左傳淺說二卷，孝經鄭注疏二卷，六藝論疏證一卷，鄭志疏證八卷，附鄭記考證及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，魯禮禘祫志疏證一卷，三疾疏證一卷，聖證論補評二卷，師伏堂筆記一卷，經訓書院自課文三卷，師伏堂駢文四卷，師伏堂詩草六卷，師伏堂詠史一卷，由合堂談古□卷。他的著作的內容，雖沒有很偉大的創見，如同時幾位著名的經今文學大師，但學術門徑很清楚，善於整理舊說，所以如經學歷史、五經通論等書，對於初學者，真可稱爲「循循善誘」。他的

著作，大抵於光緒間由湖南思賢書局刊行，流傳不廣。惟經學歷史曾有上海羣益書局鉛印本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，今文尙書考證曾有師伏堂自刊本。

因爲皮氏是經今文學者，所以同時經古文學者頗非難他。章炳麟在文錄卷一駁皮錫瑞三書中譏斥得很利害，陳漢章在經學通論^①附錄中亦表示着不滿意。陳氏所批評的話多屬於小疵或補正，現在撮錄章氏的話於下，以見清末今古文學派的爭辯。章氏說：

「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爲之義疏，雖多持緯候，扶微繼絕，余甚多之。其後爲王制箋、經學歷史、春秋講義三書，乃大誣謬。王制箋者，以爲素王改制之書，說已荒忽；然王制法品，盡古今夷夏不可行，咎在博士，非專在錫瑞也。經學歷史，鈔疏原委，顧妄以己意裁斷，疑易禮皆孔子所爲，愚誣滋甚。及爲春秋講義，又不能守今文師說，糅雜三傳，施之評論，上非講疏，下殊語錄，蓋牧豎所不道。又其持論，多以四庫提要爲衡。提要者，蓋於近世書目略爲完具，非復別錄

七略之儕也；其序多兩可，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；錫瑞爲之恆惑，茲亦異矣。……

章氏爲現代經古文學惟一大師，平素說經，反對劉逢祿、宋翔鳳、魏源、龔自珍，又反對康有爲、廖平，凡近代經今文學者，沒有不受他的譏斥；則他的呵詆皮氏爲「牧豎所不道」，毫不足怪。不過以我們第三者的眼光觀察，除春秋講義、綵雜三傳，失了今文學者立足點之外，其餘主王制，以易禮爲孔子作，正是今文學所謂「微言大義」之所在。至於引用四庫提要，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，我們似應加以原諒。

我很慚愧，我所得於皮氏的生平，僅僅簡略如是。他的生卒，他的師友，他的學術的傳授，我竟無法查考。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，但不是沒有回音，就是以「不知」答。當這樣離亂的時候，大家救死惟恐不暇，誰能留意他們以爲微末的事呢？據楊樹達先生說，皮氏的弟子某君擬爲他撰一年譜，我誠懇